

七十年抒怀：我和共和国的心脏—北京

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师程极济

1949年10月1日，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至今已70年。北京是共和国的首都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。从那时起，北京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热切向往的地方，这里我就讲一讲我和北京的因缘。

1950年，也就是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，我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毕业留校工作，从此跟随祖国成长，直到1992年退休，至今已69年，从这一点讲，我正好也是祖国“同龄人”。

1950年毕业后，直到1955年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去北京。这年11月学校派我和化学系的吴征铠先生与物理系的周士勋先生三人，去北京参观苏联在国际原子能和平利用展览会后的巡回展出，为期2周，在北京每天从教育部招待所（在前门外）到展览馆参观学习。回校后我还在系里作了汇报报告。在北京业余时间，我去参观过一次故宫，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去故宫。

第二次去北京，是1956年暑假，参加植物生理学学术讨论会，我在会上做了“植物的呼吸作用”的报告。其实，毕业后我就一直在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工作。

第三次去北京是1959年，这次是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参加苏联专家在北大举办的“放射生物化学”讲习班，从5月到次年2月。选派我是因为1958年我已开始奉命筹建生物物理学专业了。学习回来以后，在本专业里我也开设过“放射生物化学”。

1959年正好是共和国成立10周年，在北京要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。承北大校方热情相邀，我们这些进修教师也与他们师生

一起参加了游行活动，这对我们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，当然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了，但遗憾的是，那天当我们的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时，未见到毛主席，他老人家进去休息了。参加这次游行，是我对祖国成长最热烈的祝福，也是我在北京最难忘的一次活动。

1964年9-10月，我随苏步青校长带队去北京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，住在新建的前门饭店。这次会议期间有幸两次去了人民大会堂，一次是下午听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报告，一次是晚上去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“东方红”的演出。连同以前曾经专门去参观新建成的大会堂，一共去了三次大会堂。正是在会议期间，传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。在北京参加各种会议，也有两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一次是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，会后邓小平主席接见，另一次是华国锋主席接见，具体时间和会议已经记不清了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于1979年去北京参加中科院生物物理学研究所召开的“生物膜学术会议”，在会上做了“嗜盐菌紫膜”的综述报告。1980年5月去北京参加“中国生物物理学会”成立大会，在大会学术会议上做了“蛋白质与核酸的激发态与能量转移”的报告。学会成立后，我被选举为副理事长之一，后连任三届，从1980年到1990年正好10年（其中有一届是4年）。在这10年里，去北京出差、开会极其频繁，以至当时系办公室的老师跟我打趣说：“你去北京就像我们去南京路一样”。

此外，北京还是我几次出国的出发地。

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，我分管教育与科普工作。10年间除组织了四次科普报告会外，还做了两件事，一是举办了全国性的生物物

理学讲习班四次；二是由我牵头组织编写了一套“生物物理教学参考书”共 8 本，由高教出版社出版。我校参与的有：李庆国（与南开大学教师同著）的“分子生物物理学”；刘文龙、张志鸿的“膜生物物理学”；程极济的“光生物物理学”，共 3 本。为了组织编写这些书，在北京的会议就更多了。在此不一一列举。

除了学会工作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些学术活动和工作，也是在北京举办的。例如参加了两次高教部组织的“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”，其中一次在北京；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，我被聘为委员，每年都要去北京开一次科学基金评审会议，而从 1987 年开始一共 6 年，由于参加我们这个学科组（生理与生物物理学）的成员多数在北京，有 4 次会议都是在北京召开的。这段时间，中国科学院还召开了生字头（即生命科学）研究所所长会议（当时在位的还是一些老所长），邀请北大的沈同教授和复旦的我参加，一共举办了三次，都是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。此外，北大、清华、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3 个单位联合举办了“生物膜重点实验室”，也邀请我为学术委员，因此每年年底，都要去北京参加一次学术审议活动。。

虽然我这么频繁的去北京，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但回想起来，我在北京游览的地方却很少，只去过故宫、雍和宫、天坛、颐和园等处，长城倒是去过几次。现在还时时想念北京，还想再去游玩观光，坐坐高铁，但是已力不从心了。

我随祖国的日渐强盛而成长，祖国的心脏——北京，则见证了我成长过程的部分活动。啊，北京啊，北京，对你的思念还将伴我余生。